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社会弱势群体小组委员会

第一届会议
2004 年 9 月 13 日-15 日
曼 谷

新出现的人口动态：国际移徙和人口老龄化

(临时议程项目 5)

秘书处的说明

内容提要

在世界范围中，目前约占世界人口 3%，即估计有 1.75 亿人没有居住在其出生国。其中约 5 千 6 百万人居住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国际移徙尤其是从本区域和区域内的劳动力移徙，正方兴未艾。女性在国际移民中所占比例的增加具有特别的意义。

因此，国际移徙已作为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而出现。本文件注意到，虽然国际移徙对于派遣和接受国以及对于移民及其家庭而言是有益的，但是该人口群体可能易受剥削、虐待和歧视。

由于生育率和死亡率水平低，尤其是在较发达的经济体中，本区域各国的老年人比例迅速增加。人口年龄结构的结构性转变将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其中包括在老龄化速度最快的社会中刺激对国际劳工移徙的需求。

目 录

章 节	页 次
导 言	1
一、国际移徙的影响	2
二、国际移民的脆弱性	2
A . 无登记的移民	3
B . 移徙的女性化	3
C . 留守家属	5
D . 移徙工人的权利	6
E . 家务工人	7
F . 移徙与健康	7
三、人口老龄化和国际移徙	8
四、结论和所涉政策影响	10
参考资料	12

导 言

1. 在过去三十年中，世界的国际移徙量增加了 2 倍多。估计有约 1.75 亿人目前居住在其出生国之外，约占世界人口的 3%。其中约 5 千 6 百万人居住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联合国，2002a）。

2. 从亚太经社会区域以及区域内的国际移徙，尤其是劳动力移徙，在过去的二、三十年期间迅速增加。劳工移徙多数出现在西亚的产油国以及东亚和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和正在工业化的经济体。这主要是由于原籍国和目的地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以及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导致目的地国的工作年龄人口增长率低，而原籍国的增长率高。专门安排移民工人的政府和私营机构的出现推动了国际劳工移徙的进程。由于各国及其市场日益相互依存以及有关各不同国家的劳工市场情况的信息流动的增加，这种趋势在今后很可能继续，甚至加快。

3. 在过去 10 年期间，国际移民工人的分布明显增加。官方记录显示从各主要原籍国（孟加拉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菲律宾、斯里兰卡、泰国和越南）的国际移民工人人数从 1990 年的 100 万增加到 2000 年年底的 240 万人。但是，出国的移民工人的实际人数可能要比这些数字所显示的要多，因为仍有未向国家当局登记的在本区域内流动的移民工人人数未知。此外，上述估计数不包括如印度和尼泊尔之间、从孟加拉国到印度阿撒木或中国与俄罗斯联邦之间的跨越陆地边界的人口流动。据估计，在 200 年年底，在东亚和东南亚各主要目的地地区居住的外国工人约 550 万（Huguet，2003 年）。

4. 劳工需求与供应以及收入的差距决定了大量跨越各国边界的人口流动。全球化加强了国际移徙的趋势，亚太经社会区域内的各种类型的移徙流动存在很大的多样性。大体而言，这些移徙可分类为合法或不合法，以及临时或长期的移徙。每种形式的移徙对于原籍和目的地的社会 and 经济发展都产生不同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有些类别的移徙有了很大的增加，构成了特别的挑战。其中包括难民、避难者、被拐卖的妇女和儿童以及非法的劳工移民的流动。最近的迹象也表明妇女在国际移民中的比例正在增加。

5. 本区域大多数国家目前正出现的人口动态产生了日益增多一大群年轻人，这

种趋势很可能在今后几十年将继续下去。这种趋势加上越来越多的教育、信息的获得以及运输的改善，可能增加移徙量。此外，移徙正变得更为复杂，其模式正在产生变化。这再也不是个人的一次性流动，而是牵涉到多次的流动，常常牵涉到其他家庭成员。

一、国际移徙的影响

6. 国际移徙已作为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出现了。它不仅对原籍国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对于这些国家以及派遣国而言也具有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移徙对于涉及的人及其家庭和社区成员的生活产生影响，涉及到各因素，如流向家庭的汇款和收入、获得更多的信息、商品与服务。汇款收入不仅对于移民及其家人而言是有益的，对于国家经济而言也是有益的。

7. 移民工人给家庭的汇款量与移民工人数量本身一样大。移民工人的汇款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许多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虽然很难有准确的估量数，但是本区域有几个国家每年收到的工人汇款超过 10 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最近提供的估计数表明，每年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汇款超过 800 亿美元，这比富裕国家各发展机构所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的金额要高得多（国际货币基金，2002 年）。

8. 在扶贫中对国际和国内来源提供的汇款的衡量和作用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可以将汇款的流入视为移徙与经济相关的指标。例如，汇款在菲律宾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占 8.2%，斯里兰卡占 6.3% 以及孟加拉国占 3.8%。在世界各国中，就汇款量而言，印度排名第一，达 110 亿美元，约占 1999 年国民生产总值的 2.6%（亚太经社会，2003 年 a）。虽然印度没有做系统的研究以评估汇款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但是最近进行的大规模考察研究表明，喀拉拉邦是前往西亚移民的最重要来源，因而在印度的汇款总额中占重要的比例。印度前往波斯湾各国的移民约有 36% 来自喀拉拉邦。最近从卡罗拉不断增加的国际移民对于该邦的经济、社会、人口、政治和宗教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总的来说，移徙被视为对喀拉拉邦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主要的结果是失业的下降以及贫困线以下人口比例的下降（Rajan，2003 年）。

二、国际移民的脆弱性

9. 亚洲及太平洋区域面临全球和区域发展趋势不断带来的新挑战，所有这些挑

战对于个人、家庭和社区都产生深刻的影响。虽然改善生活的机会增加了，但是本区域很多人仍面临各种障碍，阻碍平等参与发展进程。没有获得基本的服务的人太多了，因为他们居住在遥远或资源贫乏的地区，或因为他们由于年龄、健康、居住环境或职业而处于弱势。有些人得不到服务，因为他们属于少数民族，或被认为在社会上低劣的社区、或仅仅因为他们是移民、妇女、老年人或残疾人。

10. 人口流动的增加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正方兴未艾。移徙流动类型的多样性，如定期和不定期、临时和长期以及汇款的重要性、移徙与发展之间的联系，这一切都显示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和严重性。这些新出现的人口问题具有重大的影响，因为亚洲及太平洋的发展中国家仍然没有为如国际移民等弱势群体提供社会保护的足够体系。本文件突出强调国际移民脆弱性问题，尤其是无登记的、女性、留守的移民家属、无技能的移民工人以及家佣等。

A. 无登记的移民

11. 有人指出，为应付劳力短缺，一些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开始从本区域人口和经济转变初期的各国引入大量的劳工移民。虽然许多目的地国对于接受具有专业和技术技能的外国工人有各种政策，但是却没有接受无技能劳工的政策。这就造成无登记的移徙。为满足对外国工人（有技能和无技能的）的需求以及扩大经济发展的劳动大军，这些国家最近采取了各种措施，通过设立新的入境渠道雇佣劳工。许多劳力输出国对于派遣正式合同工人有各种程序，但是由于耗时、派遣程序烦琐和费用昂贵，工人们势必避免这种制度而离开国家（Hugo，2002年）。因此，无登记移徙的人数在上升。

12. 这些无登记的移民据报道面临严重的被虐待和剥削，从而产生了移民保护的问题。还有一个风险是这些移民，尤其是无技能和无登记的移民常常被安排高风险、低收入的职业。他们被迫接受肮脏、危险、困难以及当地工人拒绝的工作。因此，与当地工人相比，移民工人要接受更高风险的职业危害。移徙工人由于不熟悉该国、文化和语言而很少意识到他们的权利（世界卫生组织，2003年）。

B. 移徙的女性化

13. 女性化已成为东南亚国际劳工移徙的重要特点。较早的研究显示，越来越多

的妇女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斯里兰卡迁移到西亚石油富裕国家工作。例如，在西亚寻找就业的斯里兰卡妇女的人数不断上升，从 1988 年的 9 千人上升到 1994 年 4 万 2 千人，以及到 1996 年上升到 11 万 5 千人。重要的接受国为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联合国，2003 年）。

14. 最近几年，妇女自己而不是陪伴家人移民海外就业的趋势日益增加。很多情况下，这些妇女比男人受教育更少（Skeldon，2003a）。来自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斯里兰卡的国际劳工移民的大多数是女性，妇女在泰国的移民中所占的比例日益增加。女性移民有很大比例是从事家政工作。但是，来自菲律宾的许多女性移民作为护士、教师和信息技术工作者被雇佣。女性移民工人的多数目的地为中国香港；日本；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亚太经社会，2003a）。Yeoh 等人所审评的各项研究（2004 年）表明，移民海外的多数妇女从事家政工作。比如，占一半以上的斯里兰卡妇女到国外从事“女佣”的工作，印度尼西亚的绝大多数女性移民在中东以及在东亚和东南亚从事家佣工作。

15. 女性移民可持续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对家政工作人员、护理人员 and 表演人员的需求。由于作为家政工作者移民的女性工作者的数量增加了，关于这些工作者在目的地被歧视、剥削和虐待的报道也增加了。人们注意到，女性移民尤其是家政工作者和表演者，由于其工作性质尤其易受剥削。不象男性工作者，他们更可能在工厂、建筑工地或大农场成群的工作，女性移民常常在孤立条件下工作，这使得她们很难建立信息和社会支助的网络。由于家政工作者的合同常常是十分有利于雇主的，对工作条件没有什么监督。；例如，家政工作者是不准带家属一起入境的，其劳动合同的条件通常是不公平的。新加坡有严格的政策，不允许外国家政工作者与其家人一起移民，也不允许她们在就业期间怀孕。即使在象在中国香港这样的地区，那里有许多移民工作者组织积极支持移民妇女，但外国家政人员仍面临困难的待遇，如冻结薪水和减薪等（Yeoh 等人，2004 年）。

16. 劳动力输出国政府对于在海外工作的公民的权利及其工作条件非常关切，采取了各种措施保护他们免受虐待和歧视。这些措施包括为打算到外国从事家政工作者的妇女规定最小年龄以及干脆为在原籍对其家政工人的招聘和派发程序规定准则等。例如，印度将打算从事家政工作者的妇女的最小年龄定为 30 岁，印度尼西亚为 22 岁，而巴基斯坦为 35 岁（联合国，2002a）。有些国家更加积极地保护其海外的移民工人。在这方面，斯里兰卡国外就业局采取了认真的措施，将外国机构列入黑名单，禁止他们征聘其国民到海外就业，理由是他们未能遵守合同的条件，其中包括没有支付薪水以及对

投诉没有回应。菲律宾政府也有通过建立海外工人福利管理局以及改革菲律宾海外就业管理局来保护和促进其移民工人的福利的悠久历史。其中最重要的是通过了《1995 年移民工人和海外菲律宾人法案》，被认为是政府明确宣布保护菲律宾海外工人(Yeoh 等人，2004 年)。

17. 移徙对于妇女地位所产生的影响既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取决于移徙发生的社会、经济、文化和家庭的背景。斯里兰卡的例子显示，虽然妇女在经济上是积极的，但是大多数人从事没什么地位的低薪酬职业。虽然移民妇女获得了财政上的好处，但是消极影响可能超越积极的益处。由于缺乏对女性移民的保护，使她们易受虐待和剥削 (Ukwatta,2003 年)。

18. 印度尼西亚的例子进一步说明移徙的性别方面大多被忽视了。有人指出，目前妇女占据印度尼西亚移徙的主要地位，1994 年和 1999 年期间只有 88 万男性移民工人，而到海外的女性移民工人约有 200 万。这种格局主要是由于西亚各国提供家佣的工作机会。移民工人的数量在过去几年稳步增长，主要是由于印度尼西亚经历了 1997 年年中经济危机。有人指出，虽然经济原因仍然是妇女移居海外的主要动机，想找机会到麦加朝圣的宗教因素也是迁移到沙特阿拉伯的一个重要动机 (Hatmadji，2003 年)。

19. 有人强调，除了财政收益之外，这些移民工人也经历了各种消极方面。比如，工作条件差、低薪、暴力、工作时间长和雇者的口头、肢体和性虐待是常见的。随着离婚数量的增加也使家庭问题增多，母亲不在也明显对孩子健康产生的利影响。有人强调，由于移民工人没有文化，限制了他们获得法律保护，使他们易受征聘中介的摆布以及受其海外雇佣者的虐待。

C. 留守家属

20. 国际移徙频频造成家庭成员的分离，从而产生了对核心家庭的更大依赖，大家庭关系削弱，核心家庭成员特别是妇女就必须承担更多责任。国际移徙者的家属处境脆弱，因为那些“留守”的人特别是被供养的家庭成员面临着社会和感情的双重后果。遗留在家的妇女也面临着诸如孤单、孤立和经济困难等许多艰难困苦。家庭成员长期分离，造成许多不良后果，例如妇女和儿童的精神病发病率提高、学习成绩下降、儿童的社会和心理发展障碍以及老年人遭到遗弃。移徙者长期与家庭成员分离，造成婚姻的不稳定

从而家庭解体，移徙者家庭离婚率上升。(Hugo, 2002)。

21. 但是，有人指出在某些情况下，国际移徙从几个方面给留守在家的家属带来了好处。这些家庭采纳了更为现代的生活方式。汇款为没有就业机会的家庭带来收入。有研究表明，许多家庭利用汇款修建新房，送孩子上学，还有一小部分移徙者利用其积蓄经营小本生意。

22. 移徙也使妇女在家庭和社区的社会及经济地位有所改善。有证据表明，尽管留在村庄的男性亲属可能保持了总体主导地位，但男性劳动力的移徙使留守在家的妇女地位有所改善(亚太经社会，2001)。移徙者的经历有喜有忧，但即使处境艰险遭受剥削的妇女移徙者，也往往认为移徙在生活的某些方面改善了其自主性(Hugo, 2002)。

D. 移徙工人的权利

23. 移徙工人的权利、权益往往薄弱或不明确，这部分是因为大部分区域内的劳动力迁移都是隐形或无序的。例如，西亚移徙工人权利有限，因为他们要么依据客工政策被雇用，要么只有一年可延期合同。移徙工人没有任何调换工作的灵活性，允许带家属的工人仅限于几类。移徙工人未经雇主书面同意不得离开其就业的国家。虽然波斯湾地区某些派出国和接受国签有双边协定，但这些对移徙工人在其就业国所受到的待遇影响甚微。亚洲大部分经营劳动力移徙的招聘和安置机构直到最近都不负责处理移徙者受剥削和虐待的案件。许多派出国政府对其海外国民遭受虐待和侮辱的问题日益关切。例如，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政府已采取措施，通过保险等形式保护其海外劳工。许多亚洲国家大使馆现在已配备了专门处理移徙者事务的劳务随员。对移徙工人的这种日益关切，已促使接受国更新并重新制订其移徙者立法和做法(联合国，2002a)。

24. 一项对在日本的泰国移徙工人的研究表明，这些工人大部分是非法或未经注册的工人，极少或根本没有医疗或法律保护，常常受到雇主的虐待或剥削。大部分人虽已在日本生活多年，但仍感到难以为日本社会所接受。

25.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近期跨国偷渡和拐卖人口的增长，特别是逼迫妇女从事卖淫业。许多妇女被诱骗，以为与留在家中相比移徙可赚取和积存更多的钱。(Chantavanich, 2003)。

E. 家务工人

26. 如前所述,由于服务业和娱乐业特别是对家庭用工劳务需求的增长,许多东南亚国家的女性劳动力移徙者高速增长,往往超过了男性移徙者的人数。在微观层次,女性家务工人的原籍国都认为她们给国民经济带来了好处。在中国香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家务工人短缺,当地人不愿从事此类工作,因此外国家务工人填补了空缺,使东道国的妇女得以进入正规产业,赚取工资。但是,与女性家务工人带来的经济收益相比,其遭受剥削和欺侮所造成的社会成本更为严重,这尤为令人关注(Asia, 2003)。因此,应特别注意家庭服务业,消除妇女在这些领域的脆弱地位。家务工人易受剥削,因为她们没有任何支持网络;她们往往寄人篱下,受虐待时没有目击者。更加重要的是,有时她们也得不到当地劳动法的保护(Hugo, 2002)。

27. 研究表明,与男性移徙者相比,女性移徙者对家庭稳定有消极影响,特别影响儿童的身心健康。妇女移徙后,男性无论如何愿意承担责任,都无法完全担当母亲的角色。儿童尽管可以迁就母亲的短期外出,但由于母亲外出而造成的婚姻瓦解却可能带来难以预料的长期影响(Asia, 2003)。

F. 移徙与健康

28. 国际社会对国际移徙者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他们常常为社会排斥,不能享受作为人应享受的健康和医疗。这些人群得不到医疗,向东道国经济作出贡献的能力也将因此受到严重制约(世界卫生组织, 2003)。这个问题最为显而易见,但是却最少得到理解或重视(Skeldon, 2003b)。因此,需要妥善解决移徙者的健康问题。

29. 移徙者健康的脆弱程度取决于其法律地位、就业环境等诸多因素。尽管人权法规定各国政府对其管辖内的每个人的健康都有法律责任,对非正规移徙者提供医疗服务仍常常被认为是一种慈善或国家的慷慨。国家医疗系统往往歧视未经登记的移徙者,对非公民仅提供急救服务。这严重损害了移徙者的健康,因为他们没有资格寻求医疗服务,只能坐等健康恶化。应作出努力保证所有人无论其地位如何都能够获得基本的预防性和治疗性医疗保健。健康权要求这一脆弱群体能够便捷地获得医疗设施,因为设施的位置和距离也可能造成严重问题。此外,移徙者可能无法有效利用医疗服务预防疾病,因为他们常常不了解可以获得哪些服务。因此,公共卫生当局应提高认识,向移徙者提供医

疗服务的有关信息和教育，以及进行更广泛的卫生宣传(世界卫生组织，2003)。

30. 最后，在亚洲区域特别关注的问题是，越来越多的移徙者可能助长艾滋病/艾滋病毒的扩散。显然，人口移动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移动的人口在其原住地和目的地的行为。应认识到，迁移本身可能使他们进行通常在家时不从事的高危险性活动(Skeldon，2003b)。因此，国际移徙可以对移徙者及其家庭造成不良健康影响。在某些情况下，新疾病传入一个社区可能造成深远的破坏性结果。夫妻间或在大城市卖淫的妇女返乡后造成的艾滋病/艾滋病毒等性传播疾病的蔓延，可以给家庭或社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31. 但是，国际社会在解决国际移徙者的健康及社会保护方面所起的作用令人鼓舞。

- (a) 《维也纳宣言及行动纲领》(1993)“特别重视促进和保护那些处于脆弱地位包括移徙工人在内的人的人权”，重视消除对这些人的一切形式的歧视。
- (b) 1994 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阐述了移徙和健康问题。特别敦促各国政府保证国际流离失所者得到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包括生殖健康服务及计划生育。
- (c) 北京行动纲领(1995)敦促各国政府确保全面实现所有妇女移徙者，包括妇女移徙工人的人权，保护她们不受暴力和剥削。
- (d) 全面回顾和评价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实施状况的特别联大成果文件，(1999)敦促派出国和接受国各国政府有效保护移徙者，提供基本医疗和社会服务，包括性卫生和生殖健康服务及计划生育。
- (e) 艾滋病问题特别联大(2001)敦促制订国家、区域和国际的发展和实施战略，力争在 2005 年实现向移徙工人和流动工人提供艾滋病预防服务。
- (f) 《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于 2003 年 7 月 1 日生效。公约赋予所有移徙工人无论其法律地位如何，其人权都能获得保护的权利。

三、人口老龄化和国际移徙

32. 由于生育率和死亡率低，本区域各国老龄人口的比例迅速增长，发达经济体尤其如此。人口迅速老龄化将产生更多的国际移徙需求。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人口中各年龄组人数的相对变化。这种变化的指数之一是潜在供养比(PSR)，即平均每个

退休者(65岁及以上)相对的工作年龄段人数(15-64岁)。

33. 本区域老龄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是日本。2000年,其人口近四分之一(23%)在65岁或以上。到2025年,这个数字预计将增加到35%。因此,2000年的潜在供养比仅为4.0,而到2025年将降低到2.0(联合国,2002b)。这就意味着相对于每一个65岁及以上的人,只有2个工作年龄段的人。显然,今后将需要许多从事老年人无法承担的低技能和强体力工作的工人。

34. 今后20年,中国香港、韩国和新加坡等较为发达经济体的人口也将迅速老化。联合国(2002b)预测,到2025年,中国香港6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将达到28%,潜在供养比将降低到3.3。在韩国,6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将达到24%,潜在供养比为4.0。在新加坡,联合国在假定移民减少的情况下作出推测,到2025年60岁以上的人口将达30%,潜在供养比将仅为3.0。

35. 这些经济体已出现劳动力短缺,在建筑、环境卫生、农业和制造业等重体力劳动行业中情况尤其如此。这些经济体试图通过一系列政策,包括加强自动化、吸引更多妇女进入劳动大军以及推迟退休年龄,来应对劳动力短缺,但是也无一例外地接受了更多的外国工人。

36. 尽管泰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远低于这些东亚经济体,人口相对年轻(60岁以上人口仅占8%),但其经济已经吸引大量外国工人进入诸如农业、渔业、建筑业、制造业和家务服务等强体力劳动产业。在2004年,劳动部预计将注册100万外国人进入该国就业。

37. 东亚较发达经济体潜在供养比极低、老龄人口比例高,将产生对护理者和卫生工作者的巨大需求。尽管大部分老年人不需要专人看护,但最大年龄组的人的确需要更高层次的看护,而年龄越大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也越高。

38. 在今后几十年中本区域所有国家对个人看护者的需求都将增长。(尽管印度人口只有8%是60岁以上,但其老龄人口总数却是日本的2.5倍)。护理服务既包括无需特殊技能的家务服务,也包括低技能家庭护理服务和养老机构中的高技能看护服务。

39. 医疗部门的就业将全面高速增长,既包括医生、护士,也包括看护助理和普通清扫工及其他工人。医疗管理是一个迅速扩大的职业。

40. 东亚社会的老龄化,使其国内劳动力市场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对个人护理者和医务人员的需求。相对老龄人口的增长,劳动力人数将大大下降。这些经济体将不得不

求助于外国工人，来满足不断增长的对个人看护和卫生工作者的需求。

41. 菲律宾的公共和私人培训机构认识到国际上对卫生工作者的需求不断增长，已培训大量人员供海外就业。目前，约有 25 万菲律宾护士在国外工作。

42. 亚太经社会和本区域各政府进行合作，制订了人口老龄化区域和国家政策指南。1998 年底，各国政府聚集澳门，通过了《澳门宣言》和《亚太老龄化行动计划》，并于 1999 年获得经社会通过(见经社会决议 55/4，1999 年 4 月 28 日)。《行动计划》在家庭、健康和营养、住房和交通、就业和收入安全以及提供社会服务等诸多关键领域提出了政策建议。《行动计划》指定亚太经社会为本区域老龄化及老年人事务联络中心。澳门区域会议与会各政府承诺建立组织系统，解决老龄化问题。许多政府此后都通过了国家老龄化行动计划，贯彻澳门指南。

43. 在全球一级，联合国于 2002 年 4 月在马德里召开了第二次世界老龄化问题大会。大会通过了《马德里老龄化问题国际行动计划》(MIPAA)，在老年人与发展、改善老龄健康和福利以及保证创造良好支持环境等三个优先领域提出了建议。为促进《行动计划》在亚洲太平洋的贯彻，亚太经社会在 2002 年 9 月中国上海召开了区域后续研讨会。会上通过了《上海执行战略：2002 年马德里国际老龄化问题行动计划及 1999 年亚洲及太平洋老龄化问题澳门行动计划区域执行战略》。

44. 亚太经社会秘书处在中国澳门政府支持下，正在帮助各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强化在老龄化及老龄人口方面的方案。2004 年期间，秘书处将分别在斯里兰卡科伦坡和中国北京举办次区域讲习班，以制订更为有效的方法监测和评估针对老龄人口需求的各种项目。2004 年 10 月，秘书处将在中国澳门举办区域研讨会，审议《上海执行战略》的实施初步进展。

四、结论和所涉政策影响

45. 本文指出，国际移徙既有利于派出国也有利于接受国，同时可以给移徙者及其家庭带来好处，但这一群体容易受到剥削、虐待和歧视。原籍国和目的地国政府都应继续努力，防止移徙者在招聘、候职和就业过程中遭受剥削。人们生活中易受伤害、不稳定和不安全从来都是生活的一部分，不同的是，其起因和表现在过去几十年中变化巨大，花样繁多，带来了新的和正在出现的社会问题，需要严重关注。

46. 上述人口的动态变化，促使在 2002 年在曼谷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第五次人口会议在其已经通过的人口与贫困行动计划中，加入了一些关于国际移徙的建议。行动计划敦促派出国和接受国政府在国家经济和社会计划中纳入国际移徙的合理内容。计划还建议，各国政府通过一系列行政行动使合理移徙正规化。行动计划呼吁打击拐卖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计划敦促加强区域合作，更好地管理各种形式的移徙，以利于派出国、接受国及移徙者本人(亚太经社会，2003b)。

47. 由于过去几十年中生育率和死亡率的持续下降，本区域的人口老龄化正方兴未艾。本区域所有国家的老龄人口比例都在增加，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则在总体下降。这些变化对就业、医疗保健和其它社会政策将带来重要影响。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将以各种方式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包括刺激老龄化最快的社会对国际劳动力移动的需求。本区域各国政府已通过《上海执行战略》，作为其制订和执行政策、解决与老龄化相关的正在出现的问题的指南。

48. 由于国际移徙的日益重要，联合国秘书长已任命一个全球国际移徙委员会，负责：(1) 将国际移徙列入全球议程；(2) 分析现行政策的差距，研究与其它问题的相互关系；(3) 就国际移徙的管理向秘书长提出建议。委员会将于 2005 年底提出报告。

49. 全球委员会于 2004 年 5 月 17-18 日在马尼拉召开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听证会，向各政府、国际机构、民间社会和专家征集信息。区域听证会详细讨论了：(1) 劳动力市场中的移徙者；(2) 移徙、经济增长、发展与扶贫；(3) 非正规移徙；(4) 移徙与人权；(5) 社会中的移徙者；(6) 国家、区域和国际的移徙管理。

参考资料

- Asis, Maruja M.B. (2003). "Filipino domestic workers in Singapore: impacts on family well-being and gender rela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d Hoc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27-29 August 2003 (Bangkok,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 Chantavanich, Supang (2003). "A study of unskilled Thai migrant workers in Jap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d Hoc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27-29 August 2003 (Bangkok,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 ESCAP (2001). *Social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Labour Migration in the ESCAP Regio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01.II.F.31).
- ESCAP (2003a). Report of the Ad Hoc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27-29 August 2003 (Bangkok,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 ESCAP (2003b). *Fifth Asian and Pacific Population Conference: Report and Plan of Action on Population and Poverty*.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 Series No. 159.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03.II.F.45).
- Hatmadji, Sri Harijati (2003). "Gender dimension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donesian cas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d Hoc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27-29 August 2003 (Bangkok,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 Hugo, Graeme (2002).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n the family in Indonesia",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11(1): 13-46.
- Huguet, Jerrold W. (2003).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poverty reduction", in *Fifth Asian and Pacific Population Conference: Selected Papers*,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 Series No. 158, pp. 117-136.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03.II.F.27).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2). *Balance of Payment Statistics Yearbook* (Washington, D.C: IMF).
- Rajan, S. Irudaya (2003).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from India: its economic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d Hoc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27-29 August 2003 (Bangkok,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 Skeldon, Ronald (2003a). "Migration and migration policy in Asia: a synthesis of selected cas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Regional Conference on Migration, Development and Pro-Poor Policy Choices in Asia, 22-24 June 2003, Dhaka.
- Skeldon, Ronald (2003b). "Interlinkages between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sian reg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d Hoc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27-29 August 2003 (Bangkok,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 Ukwatta, Swarnalatha (2003). "Improvement in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internal migration of females in Sri Lank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d Hoc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27-29 August 2003 (Bangkok,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United Nations (2002a).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port 2002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03.XIII.4).

United Nations (2002b). World Population Ageing: 1950-2050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02.XIII.3).

United Nations (2003). Levels and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o Selected Countries in Asia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03.XIII.2).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3).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Health and Human Rights. Health and Human Rights Publication Series, Issue No. 4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Yeoh, Brenda S.A, Shirlena Huang and Theresa W. Devasahayam (2004). "Diasporic subjects in the nation: foreign domestic workers, the reach of law and civil society in Singapore", Asian Studies Review, 28: 7-23.

.